

Shinyoung Kwon, *Moral Authoritarianism: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s in the Three Koreas, 1931-1972*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4. 392 pp.

魏龍達*

美國學界的韓國研究過去曾被批評帶有東方主義傾向，並被認為需要廣泛地參考韓國學界的研究成果，本文所引介的《道德威權主義：1931至1972年間「三個韓國」的鄰里組織》(*Moral Authoritarianism: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s in the Three Koreas, 1931-1972*)一書顯然已經突破上述研究取向的侷限。¹本書從東亞與朝鮮半島歷史的內在脈絡進行思考，而非西方衝擊與回應下的現代化史觀。作者 Shinyoung Kwon 敏銳地指出，利用鄰里組織促進政治參與並非東亞的特殊現象，許多西方國家也存在政府支持或自發形成的鄰里組織。更重要的是，本書不僅反映美國學界關於韓國研究的前沿成果，作者亦充分參考韓國學界既有積累並與韓國學者密切交流，例如，延世大學歷史系的金聖甫教授曾利用蘇聯占領軍時期文獻，對北韓土地改革進行重要研究，作者亦曾參與金教授主持的北韓研究專題討論會。²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

¹ Michael D. Shin, "Major Trends of Kore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US,"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3:1 (January 2003), pp. 151-175. Leighanne Yuh, "The Historiography of Korea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15:2 (August 2010), pp. 139-140.

² 作者 Shinyoung Kwon 於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取得博士學位，目前在劍橋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本書為其博士論文改寫而成，指導教授為芝加哥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 Bruce Cumings。Cumings 關於韓戰起源的研究是後人無法繞過的里程碑，也因此被認為「可能是對當代南韓人如何理解自身歷史產生最大影響的外國學者」。Cumings 不僅自身研究成果卓越，還培育出多位傑出研

1948 至 1951 年間曾經任教於首爾大學的歷史學者金聖七，在 1950 年 10 月的日記中提及：「解放後，人們不斷地用筆或口譴責並唾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然而，我感覺我周圍的一切都變得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這次，聲討的是那群傀儡〔北韓〕，誓不兩立的敵人；但南韓所作所為多半不過是北韓的翻版，彷彿從同一個模版裁剪而成。」（頁 1）本書在開頭引用這段日記，後並提出對於金聖七的詮釋：「在三十八年的生命中，他親歷了三個政權將鄰里空間納入政治體制之中。在每一個政權下，國家都利用鄰里組織滲透鄰里，並進一步延伸至家庭生活領域。雖然在每個政權下，鄰里組織的意識形態和名稱各有不同，但其履行的功能大致相同：情報收集、勞動動員以及政治一致性的強制執行。」（頁 161-162）

上述詮釋便為本書的核心論點：「日本帝國統治下的戰時殖民秩序與後殖民朝鮮時期之間的相似性，以及南方民主政權和北方社會主義政權之間的相似性」（頁 1）、「由於三個政權都缺乏政治正當性，它們需要藉助鄰里的道德權威，以避免完全依賴官僚力量來動員民眾」。（頁 9）更具體來說，三個政權在地方鄰里組織（愛國班、國民班、人民班）層面的連續性與相似性在於以下兩點：首先，殖民時期的愛國班，推動國家利益優先於個人權利的大眾啓蒙計畫，並使得道德與國家權威之間的界線模糊。其次，戰後南北韓的國民班與人民班，與殖民時期愛國班具有相同的啓蒙使命，並影響南北韓的威權主義。

本書分為殖民朝鮮、戰後南韓、戰後北韓三大部分，論證上述主張。第一章探討朝鮮總督府如何在 1930 年代就建立愛國班，甚至更早於日本帝國在內地建立的大政翼贊會。朝鮮總督府學務局長塩原時三郎（1896-1964）試圖動員群眾運動，對抗入侵農村的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最終選定鄰里作為組

究者，例如 Henry Em、Suzy Kim、Michael Shin、Namhee Lee。關於 Cumings 的學思經歷，見 Michael D. Shin, "An Interview with Bruce Cumings," *The Review of Korean Studies*, 7:1 (March 2004), pp. 115-143. 關於美國學界的韓國史研究典範與系譜，見 Leighanne Yuh 的簡要梳理，"The Historiography of Korea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15:2 (August 2010), pp. 127-144, 以及 John Lie 的犀利評論，"The Tangun Myth and Kore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nsnational Asia*, 1:1 (December 2016), pp. 1-40.

織運作基地。這是因為鄰里與家庭聯繫密切，殖民政府在此推動社會教化並改造家庭領域，將有助於推動國家目標。1939 年全朝鮮設立了近三十五萬個愛國班，此後國家得以進入私人家庭領域，推動以鄰里為中心的道德教化和志願行動。第二章敘述朝鮮總督府如何極力維持朝鮮既不完全與日本融合，但也不獨立於日本之外的特殊地位。1940 年 7 月，日本帝國在內地建立大政翼贊會，並透過鄰里組織在基層推動道德教化與社會動員。朝鮮受此影響而逐漸混淆愛國班（애국반）與鄰組（となりぐみ）。採用帶有政治意涵的日本組織名稱，可能會激起朝鮮人對政治與經濟改革的訴求，因此朝鮮總督府堅持區分兩個詞彙，藉以維持自身在日本帝國政治結構當中的利益。第三章聚焦在家庭層面的統治實踐，例如透過愛國班進行戶籍與住戶登記，蒐集人口統計資訊，並運用愛國班配給物資並強迫儲蓄，管控殖民地消費。本章同時也指出，愛國班這樣的鄰里組織需要女性協助，才能推動防空訓練、資源回收、減少稻米食用量等家庭生活改革。愛國班創造出女性在家庭之外的行動空間，也使得女性得以超越傳統角色，因此許多朝鮮女性願意配合日本帝國的政策。

第四至第六章探討戰後南韓的鄰里組織。第四章探討糧食危機與社會矛盾，如何使得過去的愛國班改以國民班的面貌重現。戰後初期在美國軍政府統治之下，南韓原先就存在的食品和住房短缺，復因大量海外歸國者湧入而加劇。美國軍政府為了解決糧食問題，需要人口統計訊息與配給管道，愛國班便是最有效的制度。1948 年 8 月大韓民國成立，由於南北持續對立，再加上同年的麗水抗爭事件，促使李承晚政府建立國民班，動員群眾支持反共主義並擁護政府。第五章聚焦於韓戰爆發初期的 1950 年夏天，首爾先是在六月為北韓軍隊所占領，九月又重回南韓軍隊手中，鄰里組織也因此經歷國民班與人民班之間的轉變。作者透過居住在首爾的歷史學者金聖七的視角，指出兩個政權都透過鄰里組織清算人民。除了政治反動派（如南韓的政治人物、公務員）和經濟反動派（地主階級與不願配合經濟政策者），只要在生活中使用日語就可能被北韓占領軍視為文化反動派。重回首爾的南韓政府同樣將配合人民班的國

民，冠上通敵者的罪名。第六章探討韓戰結束後，李承晚政府如何透過國民會、內政部、自由黨三種組織控制國民班以進行選舉動員，卻又因為賦予國民班地方行政的法律地位而引發爭議。國會批評政府要求人民參與國民班是違背憲法的作為，新聞媒體批評國民班是必須清除的殖民遺緒，反對黨亦批評政府利用國民班競選已違反行政中立原則。正如美國駐韓外交人員的觀察：「政府正在推進加強國民班的計畫……然而，過去的經驗表明，國民班制度可能無法發展成爲一個高效的極權體系，若在這個方向上過度推行，可能適得其反，引發大眾的對抗情緒。」（頁 163）執政黨利用國民班進行競選動員並且涉及多項舞弊行爲，最終使得李承晚在 1960 年因全國大規模抗爭而被迫下台。

第七至第九章作者將視角轉向北韓。第七章探討日本殖民時期的愛國班如何轉型爲符合北韓政治秩序的人民班。北韓並未將參與愛國班等同於親日協力，反而積極利用這個鄰里組織進行政治宣傳。相較於愛國班提倡非政治性的道德愛國主義，人民班則鼓動群眾的政治能動性並與人民民主相聯繫。戰後初期，北韓即透過人民班在各地講授投票程序，頻繁舉辦閱讀會與政治集會，並且透過人民班徵收農產品的實物稅、以及都市的營業所得稅。然而，民眾逐漸意識到人民班並非自願組織而是國家機構的一部分，積極參與的精神便隨之減弱。地方官員不得不採取強制手段以推動國家政策。第八章檢視人民班與韓戰後社會主義改革的關係。金日成提出的主體思想，強調發展重工業、建立農業合作社等自力更生的發展模式，爲了將政治經濟領域的主體思想與日常生活相聯繫，北韓又打造「偉大的紅色家庭」意識形態，要求女性向家庭成員灌輸社會主義價值觀，用以消除懶惰、輕浮與過時的思維方式。主體思想與偉大的紅色家庭這兩種意識形態的結合，使得女性在人民班當中擔任領導角色，承擔促進社區聯繫與擁護國家的責任。第九章則分析 1960 年代人民班如何形塑北韓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及人民班在千里馬運動中的關鍵角色。人民班作爲國家與私人之外的第三領域，擔負許多傳統家庭任務與經濟活動的責任，縮小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之間的距離，使民眾得以集體生活與共同決策。1960 年開始的

千里馬運動又進一步以統一政治與日常道德為口號，旨在建立「克服困難、以創造力和自力更生為特徵」的理想革命主體與社會主義生活模式（頁 277-278），最終體現為「偉大的紅色家庭」。

本書尾聲分析 1972 年南韓與北韓各別頒布的新憲法，指出兩部憲法都使得南韓與北韓的威權秩序變得更加穩固。雖然南韓與北韓都宣稱要根除殖民遺緒，但兩者都由國家主導群眾運動並利用地方鄰里組織，顯現出對於殖民制度的繼承。1987 年民主化之後，南韓的鄰里組織性質終於出現轉變，但是北韓的人民班至今都擔負實現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責任。考察從愛國班到國民班與人民班的秩序延續，作者在本書結尾提出相當具有洞見的論點：「消解戰時殖民遺緒的推動力並非民族主義，而是民主化。」（頁 298）

本書探討了三個政權，資料來源包括官方出版品、政府檔案、新聞報紙、期刊等多元類型。關於日治時期的愛國班部分，本書主要運用殖民政府發行的出版品，例如《朝鮮社會教育要覽》、《朝鮮に於ける國民總力運動史》、《國民精神總動員聯盟要覽》。戰後南韓的國民班，除了引用《大統領李承晚博士談話集》、《國民道義再建 및 國民經濟再建을 위한指導理念斗實踐要綱》、《새마을運動斗指導理念》等官方出版品，以及《國民班運營要綱》、《慶尚南道國民班運營規則》等政府檔案，也參考《再建通信》與《地方行政》等不易尋得的期刊。戰後北韓部分則明顯較為受限，雖然討論年分橫跨 1945 年至 1972 年，但是一手資料大多只能仰賴美軍於韓戰時期獲取的檔案。³

相較於史料的特殊與罕見，本書更為明顯的突破展現在研究框架層面。作者跨越殖民時期、南韓與北韓三個不同政治體制，以各時期的鄰里組織作為切入點，揭示出不同政權在群眾動員與社會控制上的共通機制。既有研究大多將殖民地朝鮮、戰後南韓、戰後北韓分別置放在日本帝國、美國、蘇聯的政治勢力範圍中，也因此大多強調三者之間的差異。本書透過比較朝鮮半島的三個政

³ 關於北韓研究資料的有限來源與史料性質，見和田春樹著，許乃云譯，《北韓：從游擊革命的金日成到迷霧籠罩的金正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 14-17；毛升，〈從敵情到學術：英文學界之北韓史研究〉，《二十一世紀》，期 174（2019 年 8 月），頁 95-108。

權，指出其制度延續性與諸多相似之處，就筆者所知，這樣的觀點極為罕見而具啟發性。抑有進者，作者還將研究視角聚焦在地方層面，指出三個韓國政權都利用鄰里組織來建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道德關係，藉以適應政權需要並鞏固自身的威權主義。這種結合宏觀的威權政體分析以及微觀的地方組織實作的比較視角，更為清晰與細緻地展現出政治權力的運作方式。

筆者相當同意將視角下放到地方鄰里組織的主張，認為本書的確提供了韓國現代史的嶄新視野。但是，都市逐漸發展與擴張之後，地方鄰里組織在多大程度上還持續形塑政治變遷的軌跡？作者在第一章提及以農村傳統為基礎的愛國班，並不適合在城市中運作。因為城市居民職業的多樣性與人口流動程度都較高，很難安排共同聚會的時間，也難以凝聚居民或打造某種團結性。（頁 46）但是在本書其他部分，並未分析「都市化」這個極為重要的社會變遷要素，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減低了鄰里組織維繫威權政體的效用？由於作者並未提供三個政權在不同時期的都市化程度數據，我們便無法確認地方鄰里組織是否持續作為三個威權政體的核心特質。

如前所述，聚焦於鄰里組織與制度延續並指出三個政權之間的相似性，是本書的重要創見。然而，作為讀者，很難不追問：既然南韓與北韓都運用鄰里組織鞏固政權，為什麼最終的發展路徑卻截然不同？本書分析至 1972 年，指出南北韓都延續殖民結構，也都創造出在地居民參與其中的威權秩序。然而，南韓早在 1960 年就出現全國性群眾運動，並迫使李承晚下台。即便在朴正熙頒布維新憲法並實施戒嚴的 1970 年代，這個被認為南韓歷史的「黑暗時代」，也持續出現各種抗爭事件，包括 1973 年韓國基督徒的神學宣言、1974 年《東亞日報》對媒體自由的宣言、1974、1975 年的民青學聯與人民革命黨事件、1976 年的救國宣言，以及 1978、1979 年統一紡織和 Y. H. 貿易公司女工抗爭。⁴可見在鄰里組織與道德威權主義之外，尚有其他政治制度或社會形構因素，更

⁴ Paul Y. Chang, *Protest Dialectics: State Repression and South Korea's Democracy Movement, 1970-197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4.

能解釋南北韓的威權政體性質與政體轉型模式。

回過頭來，筆者想要討論這本韓國現代史著作對臺灣學界有何意義。筆者認為，韓國現代史與臺灣史存在許多值得參照的變遷軌跡，交互比較殖民時期朝鮮的愛國班與臺灣奉公班的各個面向，進而探討戰後政權如何利用鄰里組織鞏固權力，將有助於深化我們對於臺灣史乃至東亞歷史的認識。⁵以下列舉幾項可供參照的思考線索。

首先，關於鄰里組織的起源。作者指出朝鮮總督府在 1938 年就設立愛國班，比日本帝國的大政翼贊會與鄰組更早：「不同於以往由日本本土主導殖民政策，殖民政府這一次自行決定在朝鮮重新引入鄰里組織制度，從而逆轉了政策由帝國中心流向邊陲的慣常模式。殖民地政府對此新制度深感自豪，並堅稱日本本土也需要建立一個與愛國班相似的組織。」（頁 27-28）相較於此，臺灣的皇民奉公會與奉公班則是臺灣總督府為了呼應大政翼贊會的產物，要到 1941 年才出現。殖民地朝鮮與臺灣在日本帝國當中的政策連動關係與影響方向殊值注意。

其次，攸關傳統女性角色的轉型。洪郁如聚焦於 1920 年代前後高等女校畢業生，如何因為接受日本新式教育，進而擺脫舊有婚姻模式與家庭成員角色，得以參與社會運動以及公共事務。這些臺灣新女性原先就屬於社會的菁英階層。⁶本書則讓我們注意到，沒有機會接受新式教育的一般階層朝鮮女性，

⁵ 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指出比較研究應該「努力產生更好的比較來面對有偏見的比較，似乎是更可取的做法。這可以部分地透過以下方式達成：將比較的雙方都視為對方預期的『偏離』，而非始終將一方視為常態」，見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 湯志傑延伸此一論點，主張以交互比較「校正實踐積非成是的慣習，加強認識論上的警醒，透過把交互檢查彼此觀察架構的盲點當作操作比較時的原則，有意識地將反省的機制內建到程序之中，盡可能避免因之而來的風險」；「重點不單在看出別人的盲點，更在於應當發現及反省自己的盲點。」見湯志傑，〈從比較到交互比較與相互連結的歷史：尋找重新認識現代性的立足點〉，收入湯志傑主編，《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台灣出發的反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頁 77、80。

⁶ 洪郁如著，吳佩珍、吳亦昕譯，《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頁 15-21。

如何透過統治體制提供的空間而突破傳統性別限制：「愛國班成爲女性賦權的場所，女性在其中擔任了實施國家控制的數據收集、配給與儲蓄系統的領導角色。同時，這些組織還使女性能夠突破將她們限制在家的傳統與習俗，並使她們能夠接觸到受教育和技能培養的機會，從而邁出了通往獨立的第一步。」（頁 78）將這兩部作品相互對照，對於殖民現代性以及「新女性」的起源將會有更完整的認識。⁷

又次，本書指出 1930 年代朝鮮總督府嘗試利用朝鮮原有的地方社會秩序以接觸廣大民眾。先由學務局長富永文一（1891-?）重建朝鮮王朝的鄉約，以此爲基礎，再由繼任局長塩原時三郎設立遍及全國的愛國班。戰後南北韓政權雖然均宣稱要清除殖民遺緒，卻又以國民班和人民班延續愛國班這個鄰里組織。這樣的情況其實並非特例，如同社會學者姚人多的洞見：「對任何統治者來說，如果能繼續沿用以往有效的統治技藝將是一個最節省成本也最理性的統治策略」。以臺灣而言，先是總督府將清代的保甲轉變爲社會與政治控制制度，戰後又有國民黨政府逐漸認識到地方基層組織的重要性，1953 年之後將村里制度轉變爲選舉動員機制。⁸值得追問的是，爲什麼李承晚透過國民班動員選民支持而遭受嚴厲批評，被迫於 1960 年辭職下台，但是延續殖民政府地方治理模式的國民黨卻能夠長期執政，而且「越到地方，國民黨的實力就越強大、越鞏固」。⁹

最後，東亞威權政體在「反動修辭」的共通性。本書指出三個政權都利用「韓國特殊性」作爲理由，以維繫具壓迫的政治體制。日本殖民者主張朝鮮人

⁷ Kyeong-Hee Choi 指出，韓國新女性的困境在於現代性來自外國壓迫者，她們越渴望擺脫自身社會的父權秩序，就越發現自己處於日本殖民主義的霸權之下，因而出現既非殖民也非民族的混雜認同。Kyeong Hee Choi, "Neither Colonial nor National: The Making of the 'New Woman' in Pak Wansō's 'Mother's Stake 1'," in Gi-Wook Shin and Michael Robinson, eds., *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9), pp. 221-247. 值得注意的是，Kwon 在本書當中並未探討這種掙扎。

⁸ 姚人多，〈政權轉移之治理性：戰後國民黨政權對日治時代保甲制度的承襲與轉化〉，《台灣社會學》，期 15（2008 年 6 月），頁 88-92。

⁹ 姚人多，〈政權轉移之治理性：戰後國民黨政權對日治時代保甲制度的承襲與轉化〉，《台灣社會學》，期 15，頁 91。

缺乏足夠的政治成熟度來自我治理；南韓政府認為韓國大眾的政治經驗不足，過早實行民主將導致社會動亂與經濟崩潰；北韓領導人認為工人階級尚未發展出足夠的階級意識，來推行社會主義革命。無獨有偶，臺灣過去也存在諸多捍衛威權政體並反對民主改革的主張。¹⁰然而，為什麼南韓與臺灣社會能夠突破，北韓至今卻仍受制於金氏王朝的主體思想？各種反動修辭的傳播與演化，如何在意識形態層面令東亞威權政體鞏固與崩潰，應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¹⁰ 吳乃德，〈反動論述和社會科學——臺灣威權主義時期的反民主論〉，《臺灣史研究》，卷 8 期 1（2001 年 6 月），頁 125-161。